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外籍媳婦照顧者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二者之照顧經驗與因應對策的比較

Foreign Daughters-in-law vs. Local Daughters-in-law Who Hire Foreign Care Workers: A Comparison of Their Caretaking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doi:10.30074/FJMH.201503\_28(1).0006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8(1), 2015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8(1), 2015

作者/Author：陳正芬(Chen-Fen Chen)

頁數/Page：101-1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503\\_28\(1\).0006](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503_28(1).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外籍媳婦照顧者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二者之照顧經驗與因應對策的比較

陳正芬

**研究目的：**台灣當代社會對成年兒子孝道責任仍是期待為老病時與其同住，但傳統上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又致使照顧責任實際轉嫁至同住的女性，特別是由媳婦這個「非子非女」的外人承擔。檢視我國家庭照顧的現況，除了與日俱增的外籍家庭監護工人數之外，外籍配偶擔任照顧者的比例亦隨之成長。本研究以媳婦照顧者的觀點，同時比較外籍配偶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之照顧經驗，瞭解媳婦照顧者如何詮釋自己的位置與因應照顧負荷的策略。**研究方法：**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並透過居家服務單位與新移民女性服務單位及鄰里長介紹方式尋找受訪者，共邀請9位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13位是外籍媳婦照顧者接受訪談，訪談進行期間為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研究結果：**居住安排是媳婦照顧者出線的主因，外籍媳婦照顧者是因為無法搬走而必須照顧，本籍媳婦卻是有能力聘僱外籍看護工而照顧。第二個主題是「照顧競爭」，平均年齡35歲的外籍媳婦照顧者處於照顧幼兒與失能老人之間的兩難，平均年齡48歲的本籍媳婦則是處於保自己或照顧老老人的身體負荷困境。第三個主題則是「照顧提供者與管理者的劃界」外籍媳婦被侷限在照顧直接提供者之疆界內，不得跨越，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則需面對資源管理與分配議題。**研究結論：**本研究呈現台灣當代社會獨特的兩類照顧者，其照顧意願與方式深受其配偶在家庭的位置與資源牽引；值得注意的是，她們都被主動或被動被排除在正式照顧體系之外，期待長期照顧體系之政策能將上述兩類照顧者的需求納入考量。

**關鍵詞：**長期照顧、外籍看護工、媳婦、外籍配偶、照顧者

陳正芬：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長期照顧、老人福利。(E-mail: czf2@faculty.pccu.edu.tw)

收稿：2014年07月12日；接受：2015年02月20日。

## 一、前言

回顧邁入已發展國家老年照顧的相關研究，老年照顧的研究焦點集中於照顧地點與照顧提供者兩大面向，也就是在那裡接受照顧，以及由誰提供照顧。檢視國內外文獻，居家由家庭成員提供照顧可謂是照顧最普遍模式，該現象在亞洲強調儒家傳統的國家更為顯著(Chappell & Kusch, 2007)。參照內政部2009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結果，65歲以上失能老人自述由兒子擔任照顧者居首位(22.30%)，依序是媳婦(14.62%)與配偶(14.25%)(內政部統計處, 2009)。但許多研究指出，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框架將照顧責任實際上又轉嫁至同住的女性身上(失能者之配偶或媳婦)，特別是由媳婦這個「非子非女」的外人承擔，與西方社會由女兒擔任首要照顧者現象出現極大歧異(Hermalin, Ofstedal, Chang, & Hareven, 1996; Holroyd, 2003; 林如萍, 張則凡, 黃秋華, 2009; 林如萍、鄭淑子、高淑貴, 1999; 胡幼慧, 1996)。換言之，華人文化中「養兒防老」是藉由兒子的婚姻制度予以延續與實踐(利翠珊、張妤玥, 2010)。

檢閱家庭照顧者相關研究，早期研究關注女性照顧者照顧角色與照顧責任等關係(陳郁芬, 1998; 溫秀珠, 1996; 賴鵬聖, 2002)，另有研究側重於家庭照顧者之負荷與支持性服務需求(李淑霞、吳淑瓊, 1998; 黃秀梨、李逸、徐亞瑛、張媚、翁麗雀, 2007)；另針對特殊照顧者身份的研究亦陸續出現，例如：女兒照顧者(涂斐珊, 2004)、男性照顧者(陳奎如, 2002)或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吳宇娟, 2004; 吳書昀, 2011)。但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昇與聘僱外籍看護工政策的開放，女性進入婚姻後承接服侍公婆的媳婦責任傳統出現結構性的轉變。藍佩嘉(2008; 藍佩嘉、吳嘉苓, 2005)以「外包孝道」詮釋媳婦承接自先生的孝親勞動責任移轉給外籍看護工的現象，第一層是將照顧責任從丈夫/兒子移轉到太太/媳婦身上的「性別轉包」，第二是將實際照顧工作從女性雇主移轉到女性監護工的「市場轉包」；而王宏仁(2001)發現外籍看護工與外籍配偶人數平行成長的趨勢，突顯台灣不同社會階級處理照顧勞務的差異策略；處於社會階層上端者，顯然透過聘僱外籍看護工而將照顧工作市場化；但位在社會階層下方者則透過迎娶外籍配偶來維持既有的照顧「媳婦化」模式，藉此穩定家庭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機制與照顧人力來源。

airiti

依據勞委會職訓局2013年底資料，進入家庭擔任看護工的外籍人數已超過20萬人(勞委會局職訓局，2013)。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2013)亦顯示，近十五年來外籍結婚登記數佔當年總結婚數的比率為10%，女性外籍配偶當中，以東南亞與大陸地區居多；但目前我國長期照顧政策制定過程中卻一直缺乏外籍勞動力(不論是透過勞動市場或婚姻市場)之探討，將使我們無法針對照顧關係及過程中「照顧三角-家庭照顧者、老人，及其他家庭成員」的互動及其可能受到的影響進一步深入探討；不僅來自另一個文化背景的「外籍媳婦」(註1)，擔任失能老人照顧者的角色形成過程與照顧經驗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本籍媳婦為何將照顧責任轉移給外籍看護工，以及聘僱外籍看護工之後對照顧型態的影響，向來是長期照顧政策漠視之議題。因此，本研究以媳婦照顧者的觀點，比較瞭解承擔照顧責任的媳婦照顧者如何詮釋自己的位置，面對照顧責任出現怎麼樣的抵抗或順服行為，期能對於我國照顧責任論的理論形成與實證資料有所貢獻，另一方面，亦期待對當前新移民女性承擔照顧者以及聘僱外籍看護工的媳婦照顧者所需的服務提供新的思維。

## 二、文獻回顧

本研究回顧國內外有關「性別與照顧」的相關研究，第一節回顧照顧責任論與照顧媳婦化的現象與理論，第二節探討家庭照顧者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意願及經驗，以構築本研究議題的先前理解，促使相關研究與論述得以彰顯。

### (一)照顧責任論與照顧媳婦化的現象

子女則被視為婚姻關係中獨特的副產品，被假設是功能障礙父母獲得支持的「第二道防線」(註2)(Silverstein & Angeles, 1998)。Cicirelli(1989)整理成年子女照顧老年父母的相關研究，歸納為公平(equity)、責任(obligation)與依附關係(attachment)三面向。公平論係源自於交換理論，所謂交換關係是立基於成本與酬賞均衡的前提，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卻因生命早期的養育而呈現一種終身的不平衡狀態，故當子女有機會照顧老年父母時，其會將照顧父母視為一個彌補這種不平衡狀態的

airiti

機會，讓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回到較為公平的層次；如果沒有盡心照顧父母則會產生罪惡感。但Cicirelli認為公平論的解釋力十分有限，因為兩者間的關係很難達到平衡的狀態。其次，責任論主張照顧父母乃是一種文化規範賦予之責任，感謝父母在生命週期早期提供的照顧，故成年子女提供的照顧動機主要是基於責任，即孝道責任(filial responsibility)之展現。第三，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依附關係建立於兒童階段，且貫穿延續至完整之生命週期，而擔任照顧者的成年子女即希望透過照顧行為來維持依附關係(Lee, 1992)。檢視華人社會裡成年子女承擔老年照顧角色的成因，相對於公平論與依附關係論，照顧責任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特別是兒子奉養父母主要來自於一種責任感的展現(Chappell & Kusch, 2007; Lam, 2006; 洪湘婷, 1997; 胡幼慧, 王孝仙, & 郭淑珍, 1995; 溫秀珠, 1996)。

但如果是由兒子來承擔照顧責任，為何會是由媳婦履行照顧角色？Lee(1992)以家事勞動(domestic labor)、茹養天性(nurturance)與親屬關係(kinship relations)三面向檢視家庭照顧女性化之成因。照顧老人向來被歸類在家事勞動的概念架構下檢視，特別是個人照顧及家務工作；而家事勞動一向被視為是由女性來擔任，即使近年來的研究顯示家務的性別分工模式隨雙薪家庭的比例提昇而逐步改變，但改變的面向仍以態度面為主，非實際行為面向。其次，提出茹養天性論學者認為運用上述家務分工的概念來解釋照顧失能父母似乎太過簡略與不切實際，其主張照顧老年父母就像母親照顧嬰兒一樣，係一項屬於女性的天職，因為男人的生理結構無法生育子女，故女性將照顧子女視為自己應承擔之角色；據此，當老年父母需要照顧時，由女性來提供撫養照顧，似乎與生命週期較早階段的勞動分工較為一致。第三，從親屬關係論檢視女性擔任照顧者的現象，文化似乎賦予女性擔任「親屬維繫者」角色，妻子與夫家接觸的頻率遠高於丈夫本人，而這樣的關係在照顧面向亦同；即使是由兒子承擔照顧責任，其照顧責任的履行又往往轉嫁至妻子。

但當家庭中不只一位媳婦時，為何有些媳婦必須承擔照顧責任，有些媳婦又得以拒絕照顧角色？Finch及Manson(1993)發現當女性不投入照顧勞務時，則需建構一個合法性的理由，該理由不僅要被家人接受，同時亦需符合婦女自身的道德觀念、名聲、認同、能力與意願等條件。媳婦本身的競爭性家庭責任顯然是關鍵因素，特別是有酬工作及兒童的照顧需求，經常成為媳婦撤出照顧失能長輩行列或承



airiti

擔較少責任的合理性理由(Dwyer, Henretta, Coward, & Barton, 1992; Ingersoll-Dayton, Neal, Ha, & Hammer, 2003)；另一方面，居住安排的選擇亦是照顧者人選的排序的關鍵因素，特別是當家庭成員彼此之間出現照顧競爭衝突狀況下，與老人共同居住者通常被視為照顧的第一順位(Cong & Silverstein, 2008; Keith, 1995)；此外，教育程度不僅會影響女性其對妻子與媳婦角色的認知，相對較高的教育程度亦可能成為經濟優勢的基礎，促使照顧者得以合理推卻照顧責任，或運用其他方式移轉照顧任務(Neufeld, Harrison, Hughes, Spitzer, & Stewart, 2001)。

值得注意的是，媳婦在家庭內權力位置乃是附屬其配偶，當其配偶兒子本身意識到且願承擔照顧責任時，其妻子擔任照顧者的機會相對增加；再者，兒子並非將照顧責任轉移給妻子，而是認為照顧父母等同時照顧子女之工作，是「妻子」責任的延伸；另一方面，對有些妻子而言，支持其丈夫執行照顧父母的責任，有助於她們在婚姻關係中取得權力；然而，對於某些在婚姻中原本即處於弱勢的妻子而言，她們則認為自己對於照顧丈夫失能父母的狀況並沒有選擇權，僅是符合其丈夫含蓄或明確的角色期待：部份社會地位及經濟資源上依賴丈夫的媳婦照顧者更感覺到自己沒有拒絕的權力，因為他們缺乏足以與丈夫協商的資源，也擔心因拒絕照顧工作而導致離婚。此外，驅使妻子承擔照顧責任的動機則是來自於互惠的期待，媳婦照顧者預期透過自己的付出，據以交換丈夫同意自己照顧原生家庭的失能父母(Guberman, 1999)。

另一方面，隨著跨國婚姻增多，國內以外籍配偶為主題的相關研究，早期以探討跨國婚姻構成因素與形成脈絡為主(王宏仁，2001；田晶瑩、王宏仁，2006；伊慶春、章英華，2006；夏曉鵬，2000，2002；陳小紅，2000，2006)，中期則開始著重女性外籍配偶來台後的婚姻調適與生活適應問題之研究(Long & Alshadye, 2005; 沈悻如，2002；陳庭芸，2002)。針對臺灣早期迎娶外籍配偶之男性多是社會階層底層的工農階級現象，夏曉鵬(2001)以巨視的國際政治經濟架構詮釋「商品化跨國婚姻」，她發現臺灣在國際分工上做為一個半邊陲國家，長期以都市及工業做為核心發展策略，造成農村空洞化，低技術勞動力難以生存的處境，被邊緣化的臺灣低技術男性，除經濟上難以生存外，再加上父權體制「男往低娶、女往高嫁」婚姻慣例，男性在國內婚姻市場上的價值逐漸低落，加上婚姻掮客推波助瀾下，促成了臺灣的外

airiti

籍配偶現象；而與外籍女性媒合不僅解決其婚姻的困境，更為農村家庭提供無酬勞動力，以及擔任無酬的照顧者。如田晶瑩與王宏仁(2006)分析台灣男子之所以透過跨國婚姻模式娶妻，係以尋找符合理想形象的妻子(即順從丈夫、孝順公婆並承擔家務的女性)為目的；正如該研究訪談一個案自述經商失敗，老家奶奶臥病在床需人照顧，同時父親又連續動二次手術，因此他選擇與交往中的女友分手，搬回老家另娶越南女子為妻。

而除了事前的篩選機制外(註3)，蔡承儒(2006)針對台南縣十位外籍配偶擔任照顧者深度訪談的結果亦顯示，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媳婦必須侍奉公婆的社會規範，促使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嫁為台灣媳婦後，亦往往得面對「入境隨俗」的再社會化歷程，承擔失能老人的照顧責任；即使外籍配偶希望外出工作，但受限於可能工作機會之職業評價及待遇較低，在家族協商的過程中，往往由薪資與職業聲望較高的媳婦(以本籍媳婦居多)繼續工作，經濟資源相對弱勢的外籍配偶不得不接下被安排的照顧者角色。陳正芬(2012)實證研究則指出，最常聽到外籍媳婦一再強調「我是媳婦ㄟ！但是…」，言下之意認為自己在身份上應該是家人，但從照顧安排的決策、協同照顧者的逐步撤離，以及家庭成員溝通的方式，都讓受訪者覺得自己被當作「非家人」的看護工對待；而她們之所以欠缺與其他家庭成員協商的權力，係因「媳婦」位置的特殊性為配偶的附屬品；受訪的外籍媳婦配偶職業多為勞動工作者或繼承家業，相較於外出打拼事業的其他男性手足，與老年父母同住者往往不具家庭事務的決策權，甚至連娶妻的聘金都是家中長輩支付，致使被設定為照顧者的外籍配偶不僅缺乏丈夫的奧援，更無力與家庭內掌權者討價還價。然而，該研究提醒，即使夫家家人在言語上將外籍媳婦貶抑為非家人之「看護工」，她們並未採取逃離媳婦角色的因應策略，而是將自己的行為表現盡可能符合台灣社會對於「好媳婦」的道德期待，期待透過承接配偶移轉給她們的照顧責任，作為外界對她們「掏金者」形象或「買賣婚姻」不實詆毀的一種生存策略。

綜言之，檢視國內外實證研究中以「性別」及「與照顧者的關係」為指標，顯示台灣社會家庭中最可能擔任主要照顧者為媳婦；再者，相較於西方社會，女性於婚後被賦予「事公婆」責任，並非源自該位女性本身與照顧者關係，而是依據其配偶與照顧者的關係，以及其家庭權力與位置而定，使得媳婦照顧者面對照顧關係感

airiti

受更強烈的規範性與情感性衝突。回顧照顧角色形成相關理論，公平論與依附關係理論較無法解釋媳婦照顧者成因，但媳婦往往因婚姻身份而因此承擔配偶移轉的照顧責任；近年來部份研究發現有職媳婦照顧者得以採用工作作為擺脫照顧責任的合理理由，或雖承擔配偶移轉的照顧責任，但採用購買服務方式來移轉照顧責任(陳亮汝、吳淑瓊，2008；謝玉玲，2007；藍佩嘉，2008)；而來自異國的外籍媳婦進入婚姻之後，究竟是因其本身的國籍而被放置於照顧者位置，抑或是其配偶在家庭位置而承擔照顧責任，是否有能力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乃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 (二) 家庭照顧者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意願及經驗

檢視大多數文獻對於照顧者角色之定義，照顧通常被視為一項特定活動，而非個人生命週期中的一種狀態。Pillemer及Suitor(2000)主張應從生命週期轉變的動態觀點討論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及社會支持的相關議題，當個人承擔老人家屬主要的照顧責任時，即符合家庭照顧者的社會定義。許多研究早已驗證，面對照顧壓力遽增的困境，照顧者會傾向引入正式服務來舒緩照顧壓力，特別是當功能障礙者有較高的照顧需求，照顧者主觀察覺本身照顧負荷遽增，且又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情況下，照顧者對服務使用的比例隨之增加(Bass & Noelker, 1987; Miller & McFall, 1991)。基於上述，當媳婦照顧者面對照顧負荷，其因應策略顯然有待探討。

英國學者Heenan(2000)曾以深度訪談方式瞭解北愛爾蘭農村婦女對正式長期照顧的期望與態度，其研究指出受訪婦女本身認為承擔照顧者的角色是非常自然且沒有疑問的歷程，因為社會規範就是灌輸女性必須實踐其肩負的道德責任。當個人態度與社會期望交互影響下，研究者發現來自政府的支持根本無法進入農村中，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社區式服務尚未普及發展，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服務接受者通常被賦予負面形象；例如女性尋求來自家庭外的協助會被視為是沒有能力管家者。

值得注意的是，照顧者對某項服務賦予的意涵亦會隨社會變遷而改變，例如過去中國成年子女因擔心使用機構式服務而被貼上不孝標籤，但現在機構式服務卻成為照顧品質的保障，甚至是子女經濟地位的象徵，機構式服務的使用量亦隨著服務意涵的變遷(從污名到殊榮)而顯著提昇(Heying, Feng, & Luo, 2008)。回顧我國探討外籍看護工相關文獻，陳亮汝與吳淑瓊(2008)分析居家失能老人使用外籍看護工相關因



airiti

素，發現當照顧者為媳婦時，其聘僱外籍看護工的使用率顯著高於子女；再者，專職就業的照顧者聘僱外籍看護工機會亦相對較高。曹毓珊(2001)針對家庭照顧者與外籍家庭監護工照顧互動主題研究的結果亦顯示，由媳婦侍奉公婆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規範，但已有部分媳婦表面上仍維持對文化規範的遵守，實質上卻透過聘僱外籍家庭監護工的方式減輕沈重的侍奉工作。陳正芬(2011)從社會學習論觀點分析我國成年子女聘僱外籍看護工現象，發現原本被賦予「外人照顧」污名的外籍看護工，則在擔任照顧者的成年子女，以及被照顧的失能老人強烈排除需遠離家庭場域與親人的機構式服務的情感驅使，以及受限於居家服務的時段與被排除於服務對象之外的困境之下，致使外籍看護工成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在照顧責任與需求滿足之間取得平衡的唯一選項，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

再者，照顧者運用正式照顧服務的意願與經驗，顯然與家庭(包括個人)特質及被照顧者的需求高度相關。Archbold(1983)將女性照顧者分為兩類：照顧管理者及照顧提供者，其主張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照顧者決定失能老人照顧模式的主要因素，職業地位較高及有較多收入的女性通常扮演「照顧管理者」的角色，她們擁有較多選項及可能性去取得照顧所需資源；其次，由於他們擁有的全職職業之評價較高，「照顧管理者」若選擇繼續工作，她們較少面臨角色衝突的情境。然而，扮演「照顧提供者」的女性，其職業評價通常較低，且收入相對較低，所得亦不足以支付購買照顧老人所需之服務，較常因應照顧負荷而辭去工作。分析兩類照顧者工作的實質內容，照顧管理者主要工作是去尋找適當服務以滿足老人的需求，所需的技巧包括評估失能長者的功能、評估社區資源的適切性，以及確定資源是符合老人所需的狀況；但照顧提供者生活步調是圍繞著被照顧者作息而定。另從照顧影響層面觀之，照顧管理者的負荷主要來自時間受限、生涯中斷、財務問題以及內疚的感受；照顧提供者自評受到影響則為行動受限、缺乏隱私，以及每天持續出現的身體疼痛感。其亦分析不同類型的照顧者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發現社經地位較高的女性較容易獲得社會支持，包括來自醫師、社會工作人員及護理人員，其可藉由來自上述專業人士提供的專業建議，減輕該類照顧者的負荷與照顧成本，但仍需要正確且容易獲得之照顧資源及轉介服務；相對地，照顧提供者卻很少來自健康照顧體系非正式的

支持，照顧的相關知識及選擇相對較為有限，且缺乏資源去購買相關的照顧服務是其最大的窒礙(Archbold, 1983; Neal et al., 1993)。

綜合上述，本研究基於對當今台灣社會長期照顧需求滿足路徑以及照顧議題的關切，認為過去研究雖已分別針對聘僱外籍看護工的照顧者，以及擔任照顧者的外籍媳婦進行探討，但卻很少在照顧責任的框架下同時探討這兩類照顧者的照顧經驗。為更細膩探究此議題，本研究聚焦於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國媳婦與外籍媳婦在照顧者角色實踐與因應對策，亦瞭解她們在照顧歷程中使用正式長期照顧服務的經驗與衝突狀況。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比較外籍媳婦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國媳婦照顧者之照顧經驗與因應對策。研究者一開始是請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與居家服務單位等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以及針對新移民婦女為對象的相關單位協助，提供合適的研究對象名單，或透過研究者的社會網絡選取符合研究目的之對象，流傳「我在找一個媳婦(擔任照顧者的「外籍媳婦」或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的研究參與邀約，選取對象的條件是以公公或婆婆因疾病或年老體弱造成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由「外籍媳婦」提供照顧者，或聘用外籍看護工來協助照顧的本籍媳婦；外籍媳婦國籍以來自東南亞國家與大陸地區為主；亦依據研究對象的建議將研究邀約擔翻譯成越南語版本，探詢符合條件並願意接受訪談的媳婦。

研究取向的選擇上，考量本研究議題涉及家戶內照顧責任的分配與移轉，以及照顧者產生過程之脈絡回顧，存在相當程度的主觀感受與動態意涵，實有必要透過研究主體(媳婦)口中得知該角色產生與移轉過程，以及對她們的意義與影響。在質性研究的典範中，人們即是透過互動、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建構出個人真實認知的世界(Mason, 2002)；其次，對任何照顧者而言，照顧的承擔多少有些不為人知的辛酸與苦楚，甚至涉及法律模糊地帶(例如聘用外籍看護工的媳婦要求受雇者不要休假，或執行契約以外的工作內容)。基於上述，本研究決定採取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進

airiti

行資料收集，並運用可根據訪談情境及受訪者談話脈絡而彈性調整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引導訪談之進行。訪談開始前，研究者會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過程與保密原則，讓研究者選擇是否受訪，以及有權選擇自己自在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場域的選定，原則上以受訪者方便且到自在的場所為首要考量，訪談次數為1-2次，不同意錄音的受訪者有1名，但同意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以紙筆紀錄。訪談進行期間是從2010年八月至2011年七月。

Strauss與Corbin(1998)強調紮根理論必須以建構理論為導向，研究過程中必須同步進行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與三層次的編碼與資料分析工作，直至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為止，也就是沒有新的或有關的資料出現、資料裡範疇都發展得十分豐厚、範疇間的關係都建立妥當而且驗證屬實(Ezzy, 2002; Mason, 2002; Strauss & Corbin, 1998)。依據上述原則，本研究受訪者選取與研究訪談是同步進行，直至訪談資料不再出現新的訊息。另一方面，受限於研究者的本身語言能力與文化背景，受訪之媳婦照顧者必須以國語陳述自身照顧經驗，部分經驗在轉述過程中具有文化轉譯的挑戰，研究者均再三與受訪者交叉驗證，惟受訪外籍媳婦照顧者來台時間均超過五年以上，語言表達的困難相對較低；但研究者仍盡量將問題口語化且放慢說話速度。

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共計9位受訪(表一)。最年長者為65歲，最年輕為30歲，平均年齡為48歲；結婚年數最久的為40年，最短為2年；平均子女數為2位，職業方面，4位上班族，2位家管，3位自營公司。配偶方面，最年長者為65歲(已過世)，最年輕為30歲，九位中僅有二位為家中獨子，職業以受雇者佔多數。被照顧者則以婆婆居多，其中有2位是共同照顧公婆；居住情況中，同住者有6位，2位不同住，1位輪住；聘請外籍看護工年數則以10年為最久，平均聘請年數為5年。

外籍媳婦照顧者共有13位接受訪談(表二)；大陸籍人數最多，共有7位，依序是越南籍4位、泰國籍1位及緬甸籍1位。年齡分佈在42歲至28歲之間，平均年齡35歲；相較於本籍媳婦照顧者，外籍媳婦照顧者平均年齡相對較低；結婚年數最久的為13年，最短為5年，平均結婚年數為8.4年；子女數以2個為眾數。配偶年齡分配在50歲至31歲之間；5位為家中獨子。職業以勞動工作者及繼承家業為主。婚姻形成的原因

表一 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基本資料表

編號	本籍媳婦							本籍媳婦配偶					聘外籍看護工	
	年 齡	結 婚 年 數	子 女 數	子 女 年 齡	居 住 地 點	職 業	教 育 程 度	年 齡	出 生 序	獨 子	職 業	教 育 程 度	聘外籍 看護工 經費支付 情形	聘外籍看護 工年數/ 次數
A01	47	22	2	16歲 14歲	台灣 北部	協助 丈夫	高中	50	三/5	否	房地產	高中	夫家 男生攤	近10年 4次
A02	62	30	3	30歲 29歲 27歲	台灣 北部	公司 老闆	國小	64	二/4	否	台商	國小	夫妻二人	7年 2次
A03	30	2	0	--	台灣 北部	上班族	大學	30	一/3	是	業務 (台商)	大學	先生	不清楚
A04	44	15	1	12歲	台灣 北部	上班族	大學	44	九/9	否	藝術 行政	大學	夫家均攤	4年半 1次
A05	50	26	2	22歲 19歲	台灣 北部	哥哥公 司上班	專科	54	二/2	否	公車 司機	高中	公公 (被照顧者)	7年 5次
A06	48	28	3	28歲 27歲 25歲	台灣 北部	家管	高中	53	二/3	是	業務	大學	夫妻二人	6年 2次
A07	50	27	4	26歲 25歲 22歲 20歲	台灣 南部	工廠 上班	-	55	三/7	否	市場	-	公公 (被照顧者)	1年多 1次
A08	38	13	1	11歲	台灣 北部	協助 丈夫	高中	38	五/5	否	自營 公司	高中	夫妻二人	8年 2次
A09	65	40	3	40歲 34歲 23歲	台灣 南部	家管	-	*	二/2	否	自營 建築 公司	-	受訪者	3年 1次

註：1.個案順序依受訪日期排序。2.\*代表「已過世」



表二 外籍媳婦照顧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外籍媳婦								外籍媳婦配偶				
	年齡	結婚年數	子女數	子女年齡	成長地點	居住地	職業	教育程度	年齡	出生序	獨子	職業	教育程度
B01	28	5	2	4歲, 3歲	北越	台灣南部	家管	高中	32	二/2	是	司機	-
B02	38	12	2	11歲, 9歲	大陸廣東	台灣南部	工廠打工	-	50	三/5	否	工廠打工	-
B03	31	5	2	4歲, 2歲	南越	台灣南部	家管	國中	41	二/2	否	農	國中
B04	34	8	2	8歲, 6歲	大陸深圳	台灣北部	麵包店打工	國中	33	六/6	否	市場	國中肄業
B05	40	10	1	9歲	南越	台灣南部	翻譯	無	50	二/3	是	*	無
B06	32	10	2	9歲, 6歲	大陸重慶	台灣北部	自營業	高中	40	四/4	否	送貨	高職
B07	40	8	2	7歲, 5歲	大陸福建	台灣北部	打工	-	41	二/2	否	市場	-
B08	40	8	3	7歲, 5歲, 3歲	泰國	台灣南部	居家按摩坊	-	31	一/1	是	工廠	-
B09	30	8	2	7歲, 6歲	大陸廣西	台灣南部	家管	國中	42	二/3	否	水電工	國中
B10	42	12	2	12歲, 10歲	緬甸	台灣南部	家庭代工	-		三/3	否	清潔工	-
B11	35	6	2	4歲, 3歲	大陸福建	台灣南部	家管	-	48	一/2	是	混凝土卡車司機	-
B12	33	11	2	9歲, 8歲	南越	台灣南部	家管	高中	47	一/4	否	板模臨時工	高中
B13	35	10	2	8歲, 7歲	大陸雲南	台灣北部	幼稚園廚工	高中	49	六/6	是	旅行社業務	大學

可歸納為「婚姻仲介」、「自由戀愛」及「親友介紹」三大類型，其中透過婚姻仲介者結婚者有6人，想嫁台灣的理由包括：「從小就想來台灣」、「姊姊妹妹都嫁來台灣」、「期待資助娘家」等；親友介紹者則有5位；自由戀愛者共有3位，1位是來台灣擔任工廠廠工期間，認識同樣在工廠工作的丈夫，另一位則是擔任外籍看護工期間，經雇主的好友介紹而認識先生，第三位則是先生擔任旅行社業務，到大陸工作期間而認識。被照顧者當中有10位是婆婆，2位是公公，一位「外籍媳婦」則負責同時照顧公公及婆婆，另有一位是照顧年長親戚(照顧先生的奶奶)；被照顧者的年齡從53歲至92歲；居住情況以共同居住為主要模式(11位)，2位不同住；不同住的2位中，一位送至養護機構，另一位受訪時已過世。

參與者在研究者引導下自由分享其擔任照顧者的生活經驗，並徵詢其同意進行錄音。訪談後立即轉換為逐字稿，紀錄受訪者非口語的訊息，例如聲調、表情與肢體動作等，並加註訪談時的情境，作為往後對文本理解的參考。資料分析方式係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著重概念與主題的萃取，不僅與過去累積的媳婦照顧者文獻相對比較與反思，另以持續比較的方式發展並檢驗各項論證：此處所指的持續比較不僅是訪談個案之間的比較。也會注意相反例證(negative cases)帶來的概念刺激(Patton, 2001)。本研究為提升研究的可靠性，資料的取得都是由研究者親自進行，並請研究團隊中的同儕進行驗證。可確認性方面，則透過反思並藉由反覆聽錄音帶及讀逐字稿與參與者所強調的意涵相結合，運用詮釋循環的方式，從整體一部分—整體間的脈絡，找出具連貫性的新知識，並透過同儕驗證和自省檢視資料，以免落入個人主觀。解釋的有效性方面，藉由結果所揭露的主題命名，檢視是否有捕捉到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及是否呈現受訪者在生活世界中的體驗與感受。

## 四、研究結果

如果使用二分法看待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與外籍媳婦，很容易就落入階級的預設立場，假設有資源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家庭屬於中上階層，而必須由外籍媳婦承擔照顧責任的家庭則為經濟弱勢家庭。近年來諸多研究已指出(田晶

瑩、王宏仁，2006；陳正芬，2012），外籍媳婦的配偶雖已從事藍領或農村工作為主，但其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匱乏，因為婚姻仲介的費用龐大，非經濟困窘的家庭足以支付；本文發現支持上述研究，部份家庭在「外籍媳婦」嫁入之前，都曾透過購買照顧服務的方式來遞補或支持照顧人力不足之處，例如多位受訪的「外籍媳婦」照顧者描述家中長輩之前的照顧安排，都提到聘僱外籍看護工或醫院看護的狀況「在我嫁來之前是有請外勞，但我嫁來後就沒繼續請了…」(B12)、「像我婆婆這次住院是要自付的，請看護一天要兩千，那這樣算下來的費用，全部到出院花了有七八萬」(B06)，但當「媳婦」必須承擔照顧責任的規範排序顯然優先於外在照顧資源，顯示媳婦擔任照顧者的現象無法由階級進行二元對立的區隔。

我不否認階級在照顧責任承擔或移轉的重要性，但照顧責任是「相對的」，也就是必須放在家庭脈絡中來看，而非單從媳婦照顧者的國籍來區分，特別是照顧者出線(註4)絕不會是單一個人的決策，就像多位媳婦照顧者都說過這句話，「畢竟媽媽是屬於大家的」。但為何是由該位媳婦承擔照顧責任？本研究比較兩類媳婦照顧者承擔照顧責任的照顧歷程與因應策略，發現可從三方面呈現兩類照顧者的差異，一是從居住安排檢視照顧責任的承擔與卸除，其次是從媳婦照顧者的年齡來檢視照顧此一重大生命週期事件發生的時間點與意涵，第三是承擔之後，其他家庭成員介入的投入或撤退，以及運用正式照顧資源的狀況。

### (一) 居住安排與媳婦照顧者的出線

內政部調查(2009)顯示，65歲以上老人仍以三代家庭居多(占37.87%)，且同一調查亦指出老人認為最理想之居住方式仍以與子女同住為首位(59.95%)，顯示當代老人認為與子女同住是最理想的養老居住方式。但當老年父母不僅只有一個子女，特別兒子不只有一位時，老年父母會選擇與誰同住？或誰會選擇與他們同住，則是量化研究較難回答的問題。不論是請問外籍或本籍媳婦照顧者，「住在一起」顯然是她們成為照顧者的主要因素，但共同居住是否等於必須承擔照顧責任？同住者是否擁有協商權力？同住者是否可以藉由搬出而擺脫照顧責任？事實上，居住安排隨時可以變動，由此可知，媳婦照顧者所謂的「住在一起」並無法完全解釋該位媳婦為

何會成為照顧者。以下分別來看外籍媳婦與本籍媳婦照顧者如何詮釋自己因「共同居住」而成為照顧者。

### 1. 外籍媳婦照顧者：搬不走的人就要照顧？

詢問「外籍媳婦」如何成為照顧者？原因雖然各不相同，但同樣都是因為家中長輩出現長期照顧需求而必須立即就位成為照顧者；長輩需要照顧的情況可依參與者的婚姻階段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被照顧者在「外籍媳婦」嫁來之前即需要照顧，共有九位；其中七位在婚前都未被告知需要擔任照顧者的工作，一位從越南嫁來的「外籍媳婦」如此形容見到行動不便婆婆的情形：

我搭飛機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半夜約12點的時候…早上就過來跟他們大人(指公公婆婆)問好，才發現“咦”怎麼她(婆婆)是坐在輪椅阿？後來才知道婆婆已經中風四、五年……(B02)

其他六位也是婚後到台灣才發現自己需立即擔任照顧者的角色，甚至發現被照顧者不僅一位。即使少數配偶事前告知，大多也是採取輕描淡寫的方式含糊帶過，例如一位經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大陸籍媳婦回憶：

他(丈夫)是有講啦！可是他沒有講說家裡那麼複雜，就是講說我姐他們都很和善啊！很好相處，然後我媽她就是很隨和啊，然後身體就是說會有一點不好啊！根本沒說他媽媽情況是這樣(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因跌倒而長期臥病在床)(B07)

回顧「外籍媳婦」就位之前的照顧安排，研究者發現兒子仍是失能老人照顧者排序的第一順位，檢視九位立即就位媳婦照顧者的配偶家庭規模及性別組成，三位是獨子，其他六位雖有其他男性手足，但不是迴避照顧責任就是未共同居住；當媳婦照顧角色缺位時，即由家中其他成員遞補；呼應陳奎如(2002)對男性照顧者的研究，即在兒子照顧者未婚，媳婦角色「缺乏」狀況下，兒子或男性配偶別無選擇地必須承擔照顧老人的責任；但隨著兒子或配偶照顧者年齡增長，這些家庭即以「外籍媳婦」來接替照顧責任，檢視受訪者成為照顧者的家庭協商類型，大多數受訪媳婦都是經歷沒有決策(non-decisions)的協商，「自然而然」成為照顧者。一位 11年前從越南嫁到台灣南部偏遠山區的「外籍媳婦」，婚後與丈夫一同幫忙公公種植龍眼，但家中收成全由掌權的公公分配；她一邊哭一邊敘說：



airiti

我聽說我小叔老婆看到這樣子(婆婆坐輪椅)，結婚第二天就搬回娘家那邊住阿！在我嫁來之前，聽鄰居說都是我老公照顧他媽媽，他們都說好可憐阿！也想說奇怪阿！一個男生每天就是煮飯阿，然後給媽吃飯…聽說他以前也有女朋友，後來媽媽中風阿，錢就花光光…女朋友也沒啦！…他(先生)後來也不想(娶老婆)…但是別人一直講東講西，他爸爸就叫他去娶一個(外籍配偶)…我來之後就是我照顧，能做就做，做到我大肚子快生了，我小姑還在叫我做…就是感覺你是外面嫁過來的，爸爸可能拿了很多錢(聘金)才叫我要做…(B03)

即使「外籍媳婦」照顧者期待同樣是媳婦身份的家庭成員加入，但配偶卻未回應妻子渴望平等分擔照顧角色的期待；一位來自大陸廣西的「外籍媳婦」，丈夫僅有國中學歷，在公公開的水電行上班，夫妻與二個小孩目前同住在公公名下的房子，與公婆隔鄰而居。針對照顧安排的提問，她語氣高亢地道出向丈夫爭取未果的過程：

我有問過我先生，為什麼大伯他們都不回來？應該要搬回來一起照顧婆婆呀！我大伯學歷很高，碩士學位，當初唸書是公公婆婆拿錢讓他去唸，可是他後來都不回老家，公公他們也都不說話…我大伯的太太是越南籍，好像是我大伯年紀很大都沒娶太太，後來人家介紹認識…我大嫂也是人家的媳婦，卻都不用照顧，很不公平！他(丈夫)就是靜靜的聽，也不會多說什麼，從來也沒幫我說話。但是我只要提到大伯的事，他就會生氣，就會說：「妳不要講啦！」(B09)

回顧外籍媳婦照顧者經歷的照顧安排描述，雖然其所屬的家庭系統考量照顧者「出線」的主要價值為正當性，特別是為地理上的可近性；受訪外籍配偶固然接受媳婦角色必須提供照顧的台灣社會傳統規範，並不接受「共同居住」等同於承接全部「照顧責任」，認為其他媳婦亦可搬回被照顧者家中共同居住來分擔照顧責任；然而，即使她們試圖要求其他同等地位的媳婦加入照顧行列，其配偶都亦抹煞其期待家庭協商的意圖。檢視「外籍媳婦」照顧者配偶在家庭體系內的權力，多數受訪者配偶的職業都是勞動工作者或繼承家業，相較於外出工作的其他男性手足，與老年父母同住者往往不具家庭事務的決策權，也就是家庭協商過程中的權力弱勢者，特別是當這位兒子透過父母資助迎娶外籍新娘，商品化的跨國婚姻預設了「外籍配

airiti

偶」必須承接媳婦照顧者的位置，「外籍配偶」被先生選中娶到台灣來，然後被放置在夫家承接媳婦照顧責任；外籍配偶照顧者需要承接多少照顧責任，顯然與外籍配偶的先生在家庭內擁有的權力與位置相關；誠如受訪者B09的訴說，即使妯娌同為外籍媳婦，但當自己丈夫的社經地位相對較低時，相對就沒有資源或討價還價的空間去行使照顧選擇權的機會，致使其他媳婦或家庭成員得以撤出照顧行列。

## 2. 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我有能力我照顧！

相對於外籍媳婦被放置在照顧者的位置，無法討價還價的弱勢位置，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承擔照顧責任的過程則呈現更加多樣複雜的關係：婆媳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過去的婆媳關係是外籍媳婦照顧者很少觸及，但這卻是本籍媳婦照顧者承擔照顧責任的關鍵因素之一。丈夫已過世，自己也已經成為老人(年滿65歲)的媳婦與患有失智症的婆婆單獨同住，她說「以前我三個兒子都是她(指被照顧者)在顧，老了就換我顧她…」(A09)；另一位丈夫為台商，自己經營工廠的媳婦也說：「我們住在一起三十多年了，生活在一起這麼久，累積起來的感情就不一樣…雖然有時候也會有疙瘩，不會說沒有啦！但她有照顧這個家，讓我們去上班」(A02)，顯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情感連結是本籍媳婦承擔照顧責任的要素之一，也是來自異國，從未與公婆培養感情的外籍媳婦欠缺之處。

此外，相較於外籍媳婦配偶在家庭協商過程中的弱勢位置，本籍媳婦之配偶的資源顯然相對較多，反而採取主動承擔其他手足照顧責任的積極策略，身為配偶的本籍媳婦似乎亦以丈夫有能力，且資源豐沛為傲。與丈夫共同經營印刷廠的黃小姐表示：「一般來講，很少一個家庭，五個兄弟姐妹會有這麼多問題，他大哥的那個智力有問題，所以他沒有辦法像正常人一樣去處理事情，那還有一個哥哥也是有一點，恩…他有癲癇就對了，姊姊嫁到花蓮就不算了…所以真的就是全部的擔子，就是我們必須要去承擔起來就對了…公公有積蓄啦，但是你知道嗎？當你有能力的時候，你怎麼忍心叫老人家出錢呢？今天我講一句坦白話，我跟我先生的經濟狀況是好比較多，我們不是付不起…」(A08)

另一位丈夫排序是老三的葉太太則已與婆婆同住多年，她表示：「我大伯是警察，所以他的時間不是很固定…而且我是住一樓，他們家住三樓，(二伯)一個是住五

樓，不方便！婆婆在這裡也比較自在」(A02)。事實上，葉太太所住的一樓是台北市少見的大坪數樓中樓格局，社區內還有寬大空間可供住戶休閒運動，其言談之間亦不經意流露出有能力照顧的驕傲感。

謝玉玲(2007)的研究指出，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往往不賦予媳婦在照顧決策可以參與或討論的空間，媳婦被期待處於一種「不踰矩」遵從表現，但往往媳婦的主體發聲是婉轉藉由丈夫的立場而傳達，產生女性主體性存在的弔詭性；比較外籍與本籍媳婦在照顧者出線的歷程，地理的可接近性顯然是家庭照顧模式形成的關鍵因素。但相較於外籍媳婦一開始就被放置在與失能婆婆/公公同住的地理位置，且無法搬出的限制情境：受訪本籍媳婦與被照顧者之間的居住安排顯然相對主動，本籍媳婦不僅會將過去婆婆(公公)對家庭的貢獻程度納入考量，且權衡配偶擁有的資源是否較其他手足來的豐沛，此種代間交換歷史或擁有資源的優越感影響了本籍媳婦對照顧責任承擔的考量。換言之，家戶內「潛在」照顧者的順位並非以媳婦的照顧競爭責任而主要考量，而是依據媳婦所依附的配偶所擁有或媳婦本身擁有的資源而定。

## (二) 媳婦照顧者的階段性任務？我到底要顧誰？

許多研究均已指出，照顧者在照顧歷程中會感受到的各個層面的照顧負荷，係因照顧者必須隨時回應被照顧者的需求，並為失能者的健康狀況承擔責任，致使照顧者在照顧歷程中經常感受到壓力與負荷，亦對照顧者的生活產生全面性的影響。然而，檢視受訪兩類媳婦照顧者年齡，本籍媳婦平均年齡高出外籍媳婦13歲，兩類生命週期與子女年齡差異極大，本節從生命週期觀點分析外籍媳婦與本籍媳婦照顧者的照顧負荷來源與負荷狀況。

### 1. 外籍媳婦照顧者：顧小的還是顧老的？

相較於過去研究發現媳婦照顧者負荷偏重身體與時間面向(陳正芬、吳淑瓊，2006；黃秀梨等人，2007)，研究者請外籍媳婦回憶照顧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身懷六甲卻仍需承擔照顧責任往往是她們最為耿耿於懷之處：

公公住院二個月，晚上也是我一直住在醫院照顧阿！不然怎麼辦？我老公上班，大伯(沈迷賭博)找不到人啊！那時候我小孩還沒生下，醫院裡雖然有護士在照顧，但

我還是會怕大小便(處理)，因為我懷孕看到(排泄物)會噁心…(B04)

那時候我小孩還沒生下來，(懷孕時)又想坐、又想躺，妳知道嗎？可是她(視障與輕度智障的婆婆)就一直走來走去…等我坐月子時，我婆婆跌倒手又斷掉，氣死人了！我覺得煩死了，(婆婆)一直在找麻煩，坐月子根本就沒人幫忙照顧，妳還給我這樣子弄！(語氣高亢急促！)(B06)

一位受訪者「外籍媳婦」的最小孩即使已經七歲，但回顧多年前懷孕生產時擔任照顧者的情境，她仍以十分激動地語氣表示，當初就是因為先生入獄服刑中，而大伯罹患精神疾病，家中小姑雖然考量她懷孕而會輪流到醫院輪夜班照顧婆婆，但自己仍然必須在白天到醫院擔任照顧者的角色，因此將自己第一個孩子未能足月生產歸因於照顧工作：

我生老大的時候，那個月她(婆婆)去開刀，我在醫院顧她，我小姑她們下班也會去顧她…因為我懷孕，她們不能讓我睡醫院嘛，所以他們下班換我回來…我顧到晚上回家，啊半夜就生小孩啊…(B13)

而即使度過懷孕、生產與坐月子艱困時期，年輕的「外籍媳婦」面對照顧行動力旺盛的幼兒與行動高度受限的失能長輩的雙重照顧競爭責任，且缺乏後備照顧者的情況之下，往往深感無力與無助，常處於維護幼兒與老人安全的兩難困境。一位擁有二個幼兒又需照顧插管婆婆的「外籍媳婦」如此陳述自己所經歷過令人膽顫心驚的焦慮時刻：

我為了省錢，都是自己帶婆婆去醫院換管…我那個老大(四歲)會騎著腳踏車，然後我推她(婆婆的輪椅)，可是他(老大)騎著在前面走，我就推老的，就是要一直追他追不過，要吼他也不是，醫院前面是一條大馬路(省道)，剛好去到那裡是紅燈，那就不能通過阿，可是孩子都不聽話的，他就一直衝，他阿嬤也一直叫，我也在叫，幸好後來變綠燈…！(B10)

## 2. 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顧自己還是顧老的？

相較於上述「外籍媳婦」照顧者所經歷的照顧負荷，平均年齡為48歲的本籍媳婦照顧者呈現邁向中老年的趨勢，體力負荷是其聘僱外籍看護工的主要考量之一。30多歲時親自照顧罹患肺結核的公公，目前聘僱外籍看護工來照顧因中風而喪失語



言與行動能力的婆婆，王太太這樣表示：

那時候(照顧公公)是因為那個外籍(看護工)不流行，而且他(指公公)的觀念也不容許我們這樣，他們認為要親人自己照顧才是那個(孝順)…；但是我們也到了快五十歲，真的不行！現在真的沒辦法半夜起床這麼多次，她(手指外勞)能讓我們一覺到天亮，真的我們超幸福…(A06)

研究者曾透過居家服務單位介紹，到台南市麻豆區訪問一位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看著眼前精緻豪華的別墅，對照自己手中的地址，一度懷疑自己是否走錯地點；按了門鈴之後，許久後才有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前來應門。該位受訪者已過世的先生是從事營造業，這棟別墅是自地自建，現在是跟已失智婆婆單獨住別墅內：

照顧她(九十多歲的婆婆)很辛苦啊！一整天都不能走(離開)，上次我去買菜，她跑到外面滑倒，流了一堆血，多大一堆耶！我趕快叫救護車把她送去新營(醫院)，那時候外勞休假(返國)…還有一次她給我爬牆耶，沒有綁她就會爬牆跳上去耶，曾經摔兩次…外勞來就沒關係了啦！所以政府不要限制啦！要給人家請(外勞)啦！」(A09)

被照顧的老奶奶在我們訪談期間，一直斜躺在我身邊的沙發與貓咪玩！受訪的媳婦表示真的捨不得把阿嬤送到安養院，現在至少每天可以看到阿嬤也比較放心！但自己也已經當阿嬤，體力沒那麼好，有時候也要幫大媳婦顧孫子，這樣顧小的跟顧老的，實在分身乏術！但對政府開放外勞的「德政」深表感激！

九位受訪的本籍媳婦當中，六位都年近或超過50歲，本身已經當阿嬤的媳婦照顧者有二位，呼應Morgan與Kunkel(2007)的提醒，隨著平均餘命的延長，成年子女擔任照顧者的時間亦隨之延後，如何同時面對自己與被照顧者的老化與失能，將是兩難的困境抉擇。誠如A02,A09, A04本籍媳婦感謝婆婆過去在照顧孫子的付出，也相對願意承擔承擔照顧提供角色；例如受訪者A09解釋丈夫過世後，即使自己以經是阿嬤，但仍獨立照顧90歲婆婆的原因，除了考量小叔相對弱勢(視障且中風)，另外兩個因素就是妯娌未曾與失能婆婆同住，且自己子女都是由被照顧者協助照顧：

她(妯娌)從以前結婚到現在都沒有(跟被照顧者)同住過，我跟她說(輪輪流照顧)，我跟她說她就說她沒辦法阿……我三個兒子都是他照顧的，這些孫子都對她很孝順，還有那些(孫)媳婦也很好，都把最好的一條魚放在最好的位置給她吃」

又如受訪者A04本身罹患乳癌後無法再幫失能公公洗澡，因此聘用外籍看護工擔任照顧者，自己轉為照顧監督角色，她表示：

其實我覺得我公婆真的對我很好…我的小孩是她(婆婆)幫忙照顧的，從滿月之後，我去上班就一直都是她幫我照顧，白天都是她照顧啦！也是捨不得這樣阿！

本研究發現，顯示即使同為本籍媳婦，過去曾有被照顧者同住，或子女曾接受被照顧者幫助的媳婦，聘僱外籍看護工之前，都曾親身擔任照顧者，這也是一嫁入夫家，尚未建立情感關係的外籍媳婦類別中，或是未曾與公婆同住的本籍媳婦訪談過程中未發現的經驗分享。換言之，當媳婦對於照顧對象有情感連結與依附情緒，就會出現顧自己或顧照顧對象的情感衝突，妯娌間照顧的公平性與責任的分擔並非她們考量的關鍵。

然而，進一步對照同時需照顧年幼子女的本籍媳婦與外籍媳婦面對的角色間衝突，兩類媳婦雖都同時承擔多個角色，但角色選擇與角色間衝突出很大差異。如前所述，受訪外籍媳婦多表示，一開始嫁入台灣就被夫家預設需承擔照顧者角色，但三位年齡層與外籍媳婦趨近，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除了A03受訪者(註5)新婚尚未生子之外，兩位年齡與外籍媳婦平均年齡相近的本籍媳婦表示，每天忙於上班與照顧小孩，實在分身乏術！誠如與先生開印刷廠的受訪者A08表示「因為真的已經下班很累了，你還要去接小孩，還要看小孩的功課，你真的沒有時間跟那個精力再去做這麼多(照顧失能公公)了…」顯示同時處於需照顧年幼子女生命週期的媳婦照顧者，外籍媳婦需要同時照顧失能公婆與年幼子女，而本籍媳婦之所以不用照顧失能公婆，係因需兼顧工作與照顧子女；換言之，同樣面對角色間衝突，外籍媳婦面對的是多重照顧負荷，本籍媳婦面對的是工作與照顧負荷，相對擁有經濟資源的本籍年輕媳婦選擇聘僱外籍看護工移轉照顧責任。但相同點卻是她們都沒有跟照顧對象建立情感依附關係，訪談過程中相對強調家庭成員分擔照顧責任的公平性。

### (三) 媳婦照顧者的因應之道—照顧提供者與管理者的界線

進一步分析從受照顧者的失能程度，本研究受訪的被照顧者皆屬於重度失能者，且需長時數與密集性的照顧協助，因此非正式的家庭支持系統之協商機制，以及正式照顧資源介入的方式亦是研究者關切的議題。傳統華人社會倫理規範中，代

間照顧的履行是媳婦角色的義務；回顧家庭照顧相關文獻，相關理論一方面將照顧者視為一項「資源」，另一方面照顧者如何運用「資源」亦常是議題之一，但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界線？運用資源的方式是否不同？

### 1. 外籍媳婦照顧者：孤單又需保持緘默的照顧提供者

如前所述，外籍媳婦的夫家未必是經濟弱勢群族，但其婚姻中商品化的特徵不僅削弱外籍媳婦權力的展現，參與家庭協商的發言地位因此遭到排擠，夫家更無時無刻不壓制或限制外籍媳婦照顧者對照顧安排的置喙機會。丈夫擔任清潔工，自己在家從事鞋底縫製代工的緬甸「外籍媳婦」，語氣激動的陳述自己在討論過程中被置身事外，卻又於照顧人力資源中被納入的過程：

我本來就在照顧我婆婆，那後來我公公也生病後，我(丈夫)二姐她來照顧，但我不知道是公公還是大伯給錢(給二姐)…我先生只跟我說二姐要來照顧喔！叫我不要講話，就是叫我不要有意見…他們家(指公公、大伯、先生與小姑等人)要說事情(照顧安排)時都站在外面(手指三合院前面的空地)，就是故意不讓我聽到…(B10)

另一位來自雲南的大陸媳婦則細數過去小姑們逐漸撤離照顧行列的歷程：

我先生是獨子又是最小的，上面有五個姐姐，像是大姐跟二姐之前沒有上班，那她們都會來家裡來幫忙照顧，就是老二週二四來、大姐是週一三五來，我嫁來後她們(姑姑們)也有來啦，但是後來慢慢就來比較少一點，那照顧的擔子就落在我身上這樣子(B13)。

值得注意的是，當研究者詢問外籍媳婦照顧者對正式照顧服務的認知與使用狀況，發現受訪者對居家服務或喘息服務等並不陌生；特別是居家服務員願意以彈性方式，支援兼負雙重照顧責任的媳婦照顧者，有助於舒緩其心理及時間面向的負荷：

我隔壁(鄰居)是居家服務員，她聽人家說都是我在顧她(婆婆)，沒有請人這樣，她就說要幫我去申請居家服務這樣，就帶我去鎮公所申請(居家服務)…對我來講的話當然比較好，因為我兩個小孩子都小，有的時候我都沒空去煮飯，因為小孩子哭阿…我就會叫她幫我一下，例如買便當阿，有的時間比較長，像小孩子前幾天感冒嘛，我去帶他去看醫生候，診所跟我說要等一、兩個小時，那我另外就跟她換(服務)

時段(B11)。

像這個(居家服務)的話，半年前我大姑有去申請，就是洗澡的問題啦，因為我就是也要顧小的啊！現在有一個人來幫忙洗澡，就是來光幫他洗澡，其他的事情還是都是我在做(B01)

真的照顧她可以，但比如說金錢甚至說去申請什麼的，我都不能說自己去作主幫她做……上次為了辦重度殘障手冊，還差點吵架…為什麼呢？我婆婆一直叫我去幫她辦重度殘障，我跟她講，存摺、身分證也都沒有在家，我要怎麼去幫你辦？而且，我說你跟姐姐他們講，她們就幫你辦，但她一直叫我幫她辦，帶她醫院鑑定呀，去市公所跑呀這…結果辦好一個禮拜，我小姑他們就打電話來了說，你為什麼去郵局查媽的錢？我就直接回答說我沒有喔，那是媽要自己要去開戶！不是我去查的喔，我就這樣回答，我講完就不再解釋了…(B04)

然而，正式服務的申請卻只能透過其他家庭成員或服務提供單位的主動介入，其他家庭成員既存刻板印象致使外籍媳婦照顧者只能擔任照顧提供者，不能跨越照顧管理的界線；相較於來自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外籍媳婦，中國籍媳婦雖具語言方面的優勢，然而，當他們跨越服務提供者界線到管理者角色，例如到金融單位處理財務或申請社會福利資源(津貼)時，反而更容易遭到其他家庭成員的質疑！因為「金錢」對於外籍媳婦具有多重複雜意義，一方面，對部分婚姻仲介媒合者而言，它是驅使她們飄洋過海以改善原生家庭經濟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卻也是她們進入夫家後感受歧視與污名的重要肇因，因此，受訪的外籍媳婦對於家庭成員是自己被夫家與台灣社會眼中「掏金者」的標籤非常敏感！如果是戀愛結婚或親友介紹者，多會向研究者一再強調自己進入婚姻的形式與「其他」外籍媳婦不同！即使透過商業中介進入婚姻的東南亞媳婦，亦會在訪談中一再強調自己基於「媳婦本分」承擔照顧者角色。對於中文運用無障礙的中國籍媳婦，碰觸到「財務管理」的禁忌後才發現，即使自己是經過被照顧者授權，仍難以掙脫既定的「掏金者」形象，僅能藉由再度退後到照顧提供者的角色，作為外界對她們或「買賣婚姻」不實詆毀的一種生存策略。顯示外籍媳婦照顧者除了對正式照顧服務的接觸經驗有待拓展，缺乏服務決策權更是服務使用的主要障礙。



## 2. 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照顧管理者如何管理資源！

對具有勞動能力且經濟自主的女性而言，藉由外籍看護工移轉照顧責任已成為近年來本國籍媳婦執行照顧義務的主要策略(陳正芬，2011；藍佩嘉、吳嘉苓，2005)；誠然，如前所述，當本籍媳婦聘僱外籍看護工後，媳婦照顧者得以獲得體力或是時間方面的鬆綁；然而，當看護工的費用是由眾子女均分，而非僅由媳婦照顧者之配偶獨立資助時，外籍看護工竟轉變成眾媳婦爭相運用的資源，連帶導致失能老人的居住模式由固定轉變為輪住模式。一位媳婦照顧者回憶，當初決定要聘僱外籍看護工時，多年來從未與公婆同住的大嫂即表示要接長輩同住，理由是其居住的大樓附有電梯，方便行動不便的公公外出就醫；但她後來發現大嫂要求該位看護工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四點到晚上十點，她描述該位看護工的工作流程如下：

早上四五點羊奶按門鈴她(外籍看護工)就下去拿，後來鄰居起來慢跑看到她，問她怎麼會那麼早起來？她說我要去樓下拿羊奶，鄰居說不是有羊奶罐嗎？…反正我大嫂就覺得有人可以使喚…起床後然後就沒辦法睡啦！就要準備小朋友上學，幫忙弄早餐，然後就換我哥哥嫂嫂要弄早餐，哥哥嫂嫂又吃的跟我公婆不一樣…然後就洗衣服啊，我嫂嫂又是那種早上要再洗一次澡的人，要求她(看護工)一定要把所有浴室的牆都擦乾，不然會發霉。所以她說光要處理那個浴室就要花一點時間，疊個棉被、整理大人跟小孩的房間，她說弄好差不多就要中午了，再曬個衣服就要做中飯了。做完中飯就要擦地板，每天都要擦而且早晚都要擦一次！(A04)。

後來該位受訪者將公婆接回自己家照顧，大嫂仍希望看護工可以到她家擔任清潔工作，經受訪者嚴詞婉拒而作罷！

另一位與婆婆同住十五年的媳婦，但卻在受訪快結束時表示，婆婆下個月就要到其他兒子家輪住。我追問輪住的原因，發現婆媳之間爭執焦點在於看護工的工作項目，該位媳婦向我說明她與婆婆發生不愉快的場景：

我為何很寒心！當初我就在附近開一家肉羹店，我們已經請印傭了，那二哥在大直那邊買個房子，媽媽要跟印傭搬去大直，但媽媽身體狀況還不錯！我跟媽媽說，媽你可不可以留下來？幫我看頭看尾，就是幫我看小孩啦！因為小孩只念半天(書)，可是去肉羹店那邊，湯湯水水，環境比較危險！但她(婆婆)講都不講，我開幕

當天，她就搬走！真的，馬上搬去！當我生意不好，半年後關了，她又搬回來！這中間當然也曾回來過，我請她幫我，但她常頂我：「二哥說請印傭來是幫她，不是幫我料理家事！」我聽的真是…常常說這句話，後來我很火大！我就說，如果是這樣，沒關係！那你都去二哥家住，把人也帶去…(A01)。

同樣地，研究者也訪談本籍媳婦對本國長期照顧體系的瞭解程度。受訪者當中超過半數以上表示：「『沒聽過』」居家服務！」，即使經由我解釋服務特性與外籍看護相似，受訪者認為服務申請程序無法請人代辦，也認為自己「不可能」申請到政府的補助；然而，對在職場工作的本籍媳婦照顧者，相較於目前我國以鐘點計算，且大多僅在日間時段提供的居家服務(註6)，可與被照顧者同居一室提供24小時貼身照顧的外籍看護工無疑是具備服務時間高度彈性的優點。一位與丈夫合開印刷廠的黃小姐，解釋她放棄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改聘外籍看護工的過程：

那時候我請台籍看護，可是畢竟她不是我家的人，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她，而且台籍的就只有照顧病人，她沒有辦法幫你做家事喔！我覺得你也不能去怪一般的媳婦，如果說今天即使我是一個正常的上班族，我都沒有辦法去做這麼多的事情，因為真的已經下班很累了，你還要去接小孩，還要看小孩的功課，你真的沒有時間跟那個精力再去做這麼多了…(A08)

訪談文本呈現外籍媳婦照顧者的敘說中有許多人物與場景的交替，代間關係中公婆、旁系親屬的姑嫂、叔伯，夫妻之家私密對話與家族共同協商，這些人物與空間的穿梭與置換顯示了代間照顧任務如何被深嵌在最缺乏位置與經濟資源的外籍媳婦身上；當外籍媳婦泣訴自己被要求「不要講話…」，深刻描繪出外籍媳婦在照顧處境中需承擔「媳婦責任」卻又需保持沉默的情境。相較於外籍媳婦照顧者被高度限制在照顧提供者的角色，本籍媳婦因聘僱外籍看護工而得以卸下照顧責任，但也因為外籍看護工的附加價值也引起其他媳婦的覬覦或婆婆不願分享照顧資源，致使失能老人與外籍看護工轉變為成年子女要求輪住的資源；或是要求看護工貼身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照顧服務，無自覺的成為外籍看護工的高度勞動剝削者。

## 五、討論與結論

隨著老人人口的攀升與平均餘命的延長，照顧人力的缺乏是全球已發展國家共通的問題(Zimmerman, Litt, & Bose, 2006)，成年子女擔任失能父母照顧者的時間因平均餘命的提高而延後，但卻需要面對自己老化與被照顧者失能的雙重挑戰(Morgan & Kunkel, 2007)。但台灣長期照顧政策卻遲遲未積極回應龐大的照顧需求，而是藉由商品化的形式，讓個別家戶透過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模式，滿足長期照顧需求的主要途徑；我們看到受訪者將長期照顧服務簡化「請外勞」或「住機構」兩種途徑，相較於長期被貼上「不孝」污名的機構式服務，外籍看護工成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在照顧責任與服務提供之間取得平衡的唯一選項，致使外籍看護工逐漸擺脫「外人照顧」的污名，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聘僱外籍看護工就成為本籍媳婦照顧者移轉照顧責任的選擇策略，邁入中老年生命週期的媳婦選擇之後還一再感謝政府的「德政」，讓他們可以做到為人子女該做的事，突顯我國長期照顧政策忽略照顧者高齡化的社會趨勢。

對於外籍媳婦照顧者來說，婚姻結合的商品化特徵，致使她們進入夫家之後仍難以擺脫自己在夫家與台灣社會眼中「掏金者」的標籤，照顧者的協商權力亦因商品化婚姻特徵而削弱；再者，由於她們的配偶多處於家庭結構的相對弱勢地位，甚至婚姻結合所需的仲介費用是由公婆挹注狀況下，外籍媳婦照顧者企求與其他媳婦均分照顧責任的期待亦因此落空。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與擔任照顧者的外籍媳婦相較，無疑是相當不公平的比較方式，但卻也因此突顯家庭內照顧責任的移轉歷程。由於社會中以普遍接納外籍看護工照顧失能老人的現況，讓原本在婚姻仲介市場中被視為商品的外籍配偶，因此被期待承擔照顧失能者的角色，致使其進入婚姻之後就必須承擔媳婦、妻子、母親與照顧者等更加多重角色。然而，相較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外籍媳婦，中國籍媳婦雖具語言方面的優勢，然而，當他們企圖跨越服務提供者界線，進入照顧管理者角色，碰觸到「財務管理」的禁忌後才發現，即使自己是經過被照顧者授權，仍難以掙脫既定的「掏金者」形象，僅能藉由再度退回照顧提供者的角色。值得關注的是，這群女性在抗議或爭論未果之後，並非採

airiti

取逃離媳婦角色的因應策略，而是將自己的行為表現盡可能符合台灣社會對於「好媳婦」的道德期待，期待透過承接配偶移轉給她們的照顧責任，作為外界對她們「掏金者」形象或「買賣婚姻」不實詆毀的一種生存策略。

然而，檢視本研究關注的兩類媳婦之照顧角色形成脈絡與照顧負荷，如果從生命週期、情感依附與照顧責任的公平性這三個軸線來分析兩個類別類媳婦照顧者的照顧經驗與因應之道，作者發現，顯示即使同為本籍媳婦，過去因同住或接受照顧對象協助，進而建立情感依附關係的媳婦，在聘用外籍看護工之前，都曾親身擔任照顧者；但對處於需照顧年幼子女與工作負荷的本籍媳婦而言，藉由聘僱外籍看護工抒解雙重照顧負荷，也就是自己選擇「顧小」，讓外籍看護工「顧老」的策略是她們在無法逃脫照顧責任下，運用本身或配偶經濟資源來選擇擔任照顧管理者角色。換言之，雖然都是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但中老年媳婦照顧者多經歷從照顧提供者轉換到照顧管理者的角色移轉過程，而年輕的本籍媳婦照顧者面對雙重照顧負荷，一開始就是確立照顧管理者的角色，並未經歷照顧者角色改變歷程。

但對同樣處於需照顧年幼子女的外籍媳婦而言，如前所述，由於一開始嫁入台灣就被夫家預設需承擔照顧者角色，但她們不僅因配偶的弱勢地位，無法與其他媳婦照顧者要求公平分擔照顧責任，更因尚未與照顧對象建立情感依附關係之前就必須承擔照顧角色，致使角色履行過程中，相較已具備情感基礎的老年本籍媳婦照顧者而言，外籍媳婦照顧者表露更多的負面照顧經驗；過去研究(溫秀珠，1996；Ingersoll-Dayton, Starrels, & Dowler, 1996)原本就發現媳婦照顧者往往是照顧者中最弱勢的族群，與被照顧者之前累積的關係最為薄弱，且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協助最少，但其執行照顧者角色時卻需背負來自被照顧與其他家庭成員的期待，但不同人對媳婦照顧者有不同期待，致使媳婦照顧者在照顧過程承擔極大的角色負荷，致使媳婦照顧者在照顧過程承擔極大的角色負荷。這現象在本研究比較兩類照顧者後確實印證，但顯然被框架在照顧提供者，且不被允許跨越，又與照顧對象缺乏情感基礎的外籍媳婦照顧者最為孤單，在照顧過程中相對較少賦予照顧正面意義或感受被肯定。

最後，檢視兩類照顧者雖符合社會傳統文化與家庭對於媳婦角色的期待，但卻也此更加鞏固與深化國家的外籍勞動力引進政策與婚姻移民取向，致使國家在長



airiti

期照顧政策的角色得以撤退。本研究揭露透露不同階級的媳婦照顧者在台灣社會中共同處境，身為照顧者，不論是否有全職工作或其他照顧年幼子女的負荷，失能老人及社會期待他們必須承擔照顧責任；是以經濟能力較佳的中高收入或中高齡照顧者，自費僱用外籍看護工來移轉照顧責任，但移轉過程卻以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與剝削外籍看護工的形式執行；國家一方面不斷宣示不得超時超量與違法使用家庭外籍看護工，但卻又將外籍看護工聘僱者排除在各項照顧服務之外，不允許外籍看護工聘僱者使用各項正式照顧服務，進一步強化了雇主與相對弱勢看護工之間的階級利益衝突。期待透過本研究之提醒，瞭解媳婦照顧者在不同生命週期都會出現角色間或角色內的衝突，進而促使政策制訂者開放外籍看護工雇主同時使用其他長期照顧服務的機會，方有可能讓本籍媳婦照顧者雇主與外籍看護工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支配與剝削的衝突對象，有可能會發展為互賴與互信的結盟關係。

最後，回顧研究者本次尋找外籍媳婦照顧者的過程，乃是結合「長期照顧」與「移民」兩大主題。但我發現不論是新移民服務中心或是長期照顧中心，對本研究設定的外籍媳婦照顧者都不甚熟悉，推論一方面許多外籍媳婦受限於照顧角色而阻礙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其次則是語言的限制。本研究受訪對象皆是嫁來台灣已超過五年者，因此我得以用中文與她們溝通，但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因訪談對象侷限於已進入正式體系(新移民服務中心、長期照顧中心或居家服務單位)的外籍媳婦照顧者，致使那些因語言限制，或是夫家刻意將其角色侷限於「照顧提供者」困境的外籍媳婦無法借此機會發聲，期待未來有機會可以讓她們的聲音與需求得以被聽見與回應。

## 謝 詞

本文是根據作者的科技部研究計畫「從照顧責任論檢視我國家庭照顧老人之多元樣貌--從聘用外籍看護工之本籍媳婦與擔任照顧者之外籍媳婦照顧經驗出發」(NSC97-2420-H-034-004-KF3)第二年與第三年研究成果的部分資料撰寫而成。本文曾於「2012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研討會進

airiti  
行發表(2012/09/22-23，台北)。感謝研究過程中諸多單位提供的協助，以及媳婦照顧者願意分享你們的照顧經驗，還有審查者提供的寶貴建議

## 註 釋

註1：過去大眾媒體習以「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稱呼嫁給台灣人的配偶，即使在台灣生活數年，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女性，仍被冠以「外籍」稱謂，標示其外來者的身份。部份學者與婦女新知基金會曾於2003年舉辦「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記者會，發起【請叫我…】徵文及票選活動，「新移民女性」成為她們最想被使用的稱呼(夏曉鵬，2005)。研究者在此處以「外籍媳婦」稱呼，係為突顯新移民女性在家庭系統內被標示的「外籍」與「媳婦」雙重角色，但加引號提醒此一稱呼的不妥之處。

註2：已婚者「第一道防線」是配偶。

註3：婚姻仲介業者製造「越南新娘」是來自貧窮且落後的化外之地，如同三、四十年前的台灣女性之乖巧柔順的形象，迎合台灣新郎需求之「傳統婦德」想像(王宏仁，2001)。

註4：本文所稱之家庭照顧者「出現」意指由誰擔任，而「出線」則是強調家庭照顧者被推舉或形成歷程。

註5：A03受訪者表示，婆婆是自己與先生婚前多年即已中風，先生求婚時表明，照顧婆婆是他的責任，他會聘僱外籍看護工照顧，不會要求妻子承擔照顧者角色。

註6：依據作者與助理在網路收集台北市及台北縣政府簽約委託提供服務的居家服務單位之服務時段，多數單位的服務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七點至下午六點，少數單位的服務間可延至晚間九點，針對週末時段，部份單位註明需事先調配。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2009)：《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內政部。
- 王永慈、彭淑華(2005)：《外籍與大陸配偶福利提供規劃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41卷，99-127。
-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台灣東南亞學刊》，3卷1期，3-36。
- 利翠珊、張好玥(2010)：〈代間照顧關係：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質性訪談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卷1期，99-124。
- 吳宇娟(2004)：《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生命故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吳書昀(2011)：〈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之照顧經驗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卷2期，79-140。
- 李淑霞、吳淑瓊(1998)：〈家庭照顧者負荷與憂鬱之影響因素〉。《護理研究》，6卷1期，57-68。
- 沈悻如(2002)：《天堂之梯？--台越跨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如萍、張則凡、黃秋華(2009)：〈台灣與韓國老人的代間關係與生活滿意：代間規範與代間交換類型之影響〉。「台灣社會福利學會2009年年會暨「健康、照護、工作與退休-新興社會風險與弱勢關懷」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縣)宣讀之論文。
- 林如萍、鄭淑子、高淑貴(1999)：〈農家代間的孝道責任期待：不同性別、世代之分析〉。《中華家政學刊》，28期，77-92。
- 林開忠、張雅婷(2003)：〈台灣媒體眼中的外籍新娘〉，見蕭新煌(編)：《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外籍新娘》。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
- 胡幼慧(1996)：〈台灣老年人口的依賴結構初探：以老年婦女為例〉。《人口學刊》，17期，83-112。

airiti

胡幼慧、王孝仙、郭淑珍(1995)：〈家人照顧失能老人的困境：一項質化與量化的整合研究〉。《公共衛生》，22卷2期，99-113。

夏曉鵬(2005)：《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

涂斐珊(2004)：《女兒照顧者角色形成與照顧經驗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正芬(2012)：〈我是媳婦還是看護工？外籍媳婦照顧者角色形成與照顧經驗之初探〉。《台大社工學刊》，26期，139-182。

陳正芬(2011)：〈管理或剝削？家庭外籍看護工雇主的生存之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5期，89-155。

陳正芬、吳淑瓊(2006)：〈家庭照顧者對長期照護服務使用意願之探討〉。《人口學刊》，32期，83-121。

陳志柔、于德林(2004)：〈台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台灣社會學》，10期，95-148。

陳亮汝、吳淑瓊(2008)：〈居家失能老人使用外籍監護工之相關因素分析〉。《台灣衛誌》，27卷1期，32-43。

陳奎如(2002)：《男性家庭照顧者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郁芬(1998)。《婦女負擔老人照顧與就業責任處境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庭芸(2002)：《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與越南新娘為例之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黃秀梨、李逸、徐亞瑛、張媚、翁麗雀(2007)：〈影響北台灣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利用的因素：前趨性研究〉。《長期照護雜誌》，11卷1期，51-65。

溫秀珠(1996)：《家庭中婦女照顧者角色形成因素與照顧過程之探討—以失能老人之照顧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趙小瑜(2006)：《家庭照顧體系與家庭協商過程之初探--以失能老人照顧為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潘淑滿(2004)：〈婚姻移民婦女、公民權與婚姻暴力〉。《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8卷1期，86-129。



- 賴鵬聖(2002)：《家庭照顧者就業狀況與其照顧負荷之關係》。國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謝玉玲(2007)：《「道德媳婦」的當代生活實踐：女性代間照顧處境之經驗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藍佩嘉(2008)：《灰姑娘的前後台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
- 藍佩嘉、吳嘉苓(2005)：〈變遷中的性別與家庭：弱勢與移民的女性照顧者〉，見王振寰、章英華(編)：《凝聚台灣生命力》。台北：巨流。
- Archbold, P. G. (1983). Impact of Parent-caring on Women. *Family Relations*, 32(1), 39-45.
- Bhurga, D., & Jones, P. (2001). Migr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7(3), 216-222.
- Chappell, N. L., & Kusch, K. (2007). The Gendered Nature of Filial Piety- A Study among Chinese Canadians.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Gerontology*, 22(1), 29-45.
- Cicirelli, V. G. (1989). Helping relationships in later life: A reexamination. In J. A. Mancini (Ed.), *Aging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pp. 167-180). Lexington, MA: Lexington.
- Cong, Z., & Silverstein,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elders in Rural China: Do daughter-in-law matt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3), 599-612.
- Dwyer, J. W., Henretta, J. C., Coward, R. T., & Barton, A. J. (1992). Changes in the helping behaviors of adult children as caregivers. *Research in Aging*, 14(3), 351-375.
- Ezzy, D. (2002). *Qualitative analysi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Finch, J., & Mason, J. (1993). *Negotiating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Guberman, N. (1999). Daughter-in-law as Caregivers: How and Why Do They Come to Care?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1(1), 85-102.
- Hermalin, A. I., Ofstedal, M. B., Chang, M.-C., & Hareven, T. K. (1996). Types of supports for the aged and their providers in Taiwan *Aging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 Life-cours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Holroyd, E. (2003). Hong Kong Chinese Family Caregiving: Cultural Categories of Bodily Order and the Location of Self.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2), 158-170.

- Ingersoll-Dayton, B., Neal, M. B., Ha, J.-H., & Hammer, L. B. (2003). Redressing inequity in parent care among sibling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1), 201-212.
- Ingersoll-Dayton, B., Starrels, M. E., & Dowler, D. W. (1996). Caregiving for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Is Gender Important? . *The Gerontologist*, 36(4), 483-491.
- Johnson, R. W. (2007). *The Burden of Caring for Frail Parents*.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 Keith, C. (1995). Family Caregiving Systems: Models, Resources, and Valu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1), 179-189.
- Lam, R. C. (2006).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the Actual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Caregiving Roles of the Modern Sandwich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7(2), 299-313.
- Lee, G. R. (1992). Gender Differences in Family Caregiving: A Fact in Search of a Theory. In J. W. Dwyer & R. T. Coward (Eds.), *Gender, Families, and Elder Care*. Newbury Park: Sage.
- Long, S. K., & Alshadye, Y. (2005). Commercial Plans in Medicaid managed Care: Understanding Who Stays and Who Leaves. *Health Affairs*, 24(4), 1084-1094.
- Mason, J.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London: SAGE.
- Morgan, L. A., & Kunkel, S. R. (2007). Aging persons and their families *Aging Society, and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Springer.
- Mossakowski, K. N. (2003). Coping with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Does ethnic identity protect mental health? .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4(3), 318-331.
- Needleman, J. (2001). The Role of Nonprofit in Health Care.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26(5), 1113-1130.
- Neufeld, A., Harrison, M. J., Hughes, K. D., Spitzer, D., & Stewart, M. J. (2001). Participation of Immigrant Women Family Caregiv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3(6), 575-591.
- Patton, M. Q. (2001).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s methods* (3 ed.). London: Sage.
-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Zimmerman, M. K., Litt, J. S., & Bose, C. E. (2006). Globalization and multiple crises of care *Global Dimensions of Gender and Carework*. California: Stanford.

# Foreign Daughters-in-law vs. Local Daughters-in-law Who Hire Foreign Care Workers: A Comparison of Their Caretaking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CHEN-FEN CHEN

**Purpos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parents still hope that their adult sons will take care of them when they are elderly. In fact, this duty usually transfers to the daughter-in-law, whether she is Taiwanese or a foreigner.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aiwanese daughters-in-law are increasingly hiring foreign workers to take on the role of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in-law. In comparison, foreign daughters-in-law tend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caring for their parents-in-law.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aretaking experience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daughters-in-law as employers of foreign care workers and foreign daughters-in-law who fill the same role as the hired foreign workers. **Methods:**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in this exploratory study. We interviewed 9 Taiwanese daughters-in-law who employ foreign care workers and 13 foreign daughters-in-law. Data collected was from August 2010 to July 2011. **Results:** The living arrangement is the main factor for deciding care responsibility. Foreign daughters-in-law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move out, so they are required to do care work. The second theme is related to the age of the daughter-in-law and the care burden: foreign daughters-in-law, averaging 35 years of age, face the challenge of taking care of themselves, if pregnant,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disabled parents-in-law. Taiwanese daughters-in-law, whose mean age is 48, they felt less physically capable of caring for disabled parents-in-law. The final research finding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are provider and the care manager: foreign daughters-in-law can be only care providers, while Taiwanese daughters-in-law ne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s of managing and distributing care resources.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wo types of care providers, their care willingness, and strategies affected by their position in their family. 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care policies in Taiwan for the situation and needs of daughters-in-law as mandated care workers and care manager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ong-term care, foreign care worker, daughter-in-law, immigrant daughter-in-law, caregiver

---

Chen-Fe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czf2@faculty.pccu.edu.tw)